



探源者说

# “红山文化第一人”郭大顺：用一生找寻中华文明5000年

□ 郭大顺(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先后主持牛河梁、东山嘴等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被称为“红山文化第一人”)

我今年85岁了。虽然1998年就退休,但一直到今天,很多工作、会议、采访还是来找我,人们还是关注红山文化。

我这辈子印象最深的考古现场,就是在牛河梁。泥塑的女神头像出土时,仰面朝天,好像微笑欲语。特别是嵌玉片的眼睛,眼神炯炯,一时间大家都围上去看。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五千年前祖先的形象。

## 瘦弱的小孩,“不拔尖”的北大学生

上初中时,我个子小小的,是班上最矮的,体育课总是不及格,连双杠都上不去。人也比较保守。人家都是留分头,我还是光头,照相就戴个帽子。上了大学,他们还说我像戴红领巾的小孩。

可能是受家里的影响,我挺喜欢读书。我是河北张家口宣化人,听我父亲讲,我祖父是当地的举人。办的柳川书院,是宣化一中的前身。我父亲也曾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我父亲把家里的300多册藏书和祖宅38间房都捐给了宣化一中。我自己读书,家里人不怎么管,主要还是靠学校。

我中学读张家口一中,是全专区招考,我初中考第八名,高中第六名,考试还总提前交卷。其实我平时不太用功,只是记忆力比较好,俄语单词记得快,做作业也快,做完了就在教室里拉二胡。我们班主任说我,“就是学习比较会抓重点”。那时候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的省会,离我们家不过30公里,但交通不便,我半年才回一次家。

我成熟得晚,也没什么特殊的想法和爱好。1957年,我参加高考,那时候的趋势都是考理工专业。我一只眼睛有弱视,考生手册说眼睛弱视无立体感,报理工科专业要吃亏,就临时改成文科。我一看文科也没有多少专业,就报了历史学。当时察哈尔省撤销了,我们家搬到了河北省省会保定。我回到家,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来了。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完大一,到了分专业的时候,有个学长推荐我选考古。我想着考古可能比读文献能多干一些实际的事,于是就报了。后来发现,也确实是在考古实习中,加强了我对专业的认识。

## 各种文化往中间聚,汇聚成中国的“中”

要说我此生考古工作唯一的遗憾,就是外语没学好,不能很好地将考古研究成果向外推广。我们读研究生时,才开始学英语,刚把音标学了一年,就出去考古实习了。

我们班是北京大学第一届接受系统考古训练的班级,要经历生产实习、写学年论文,再进行毕业实习、写毕业论文。我的两次实习都是在河南洛阳的王湾遗址,它的时间跨度比较大,从仰韶文化一直过渡到龙山文化,特征很明显,出土的器物也很丰富。我对这批材料印象很深,但更深入的认识是之后产生的。

1962年,我考了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深入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当时,苏先生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还没有正式提出,但我们已经受到了这方面教育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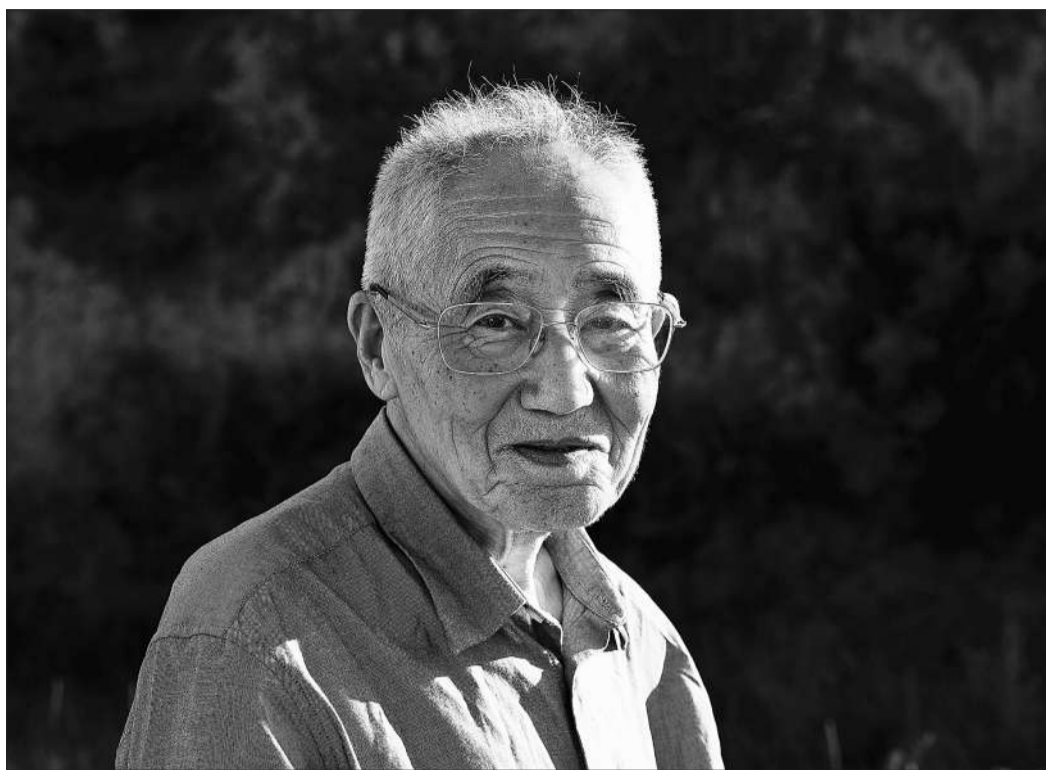
研究生实习时,我到了山东,整理大汶口遗址的材料。这个遗址和王湾遗址的时间接近,两者一东一西。王湾遗址中发现的“鼎豆壶”陶器组合,正是大汶口文化的主要特征,根据演化过程判断,洛阳王湾遗址曾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当时,中国考古界盛行“中原中心论”,认为中原仰韶文化等起源最早,对四周影响最大。1965年,苏秉琦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就提出了“东方影响中原”的观点,这在当时很是创新。他认为,中国的“中”,不是一根蜡烛往四周放光芒,而是像车轴,各种文化往中间聚,汇聚才体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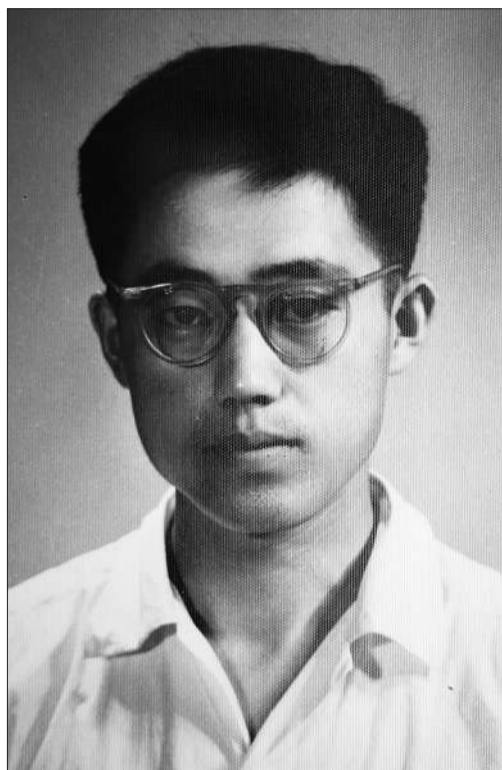
我到辽宁工作之后,逐渐在实践中体悟这个想法,这影响了我一生的考古工作。

## 辽宁“无古可考”吗

1968年,我被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时,是有点“盲目”的。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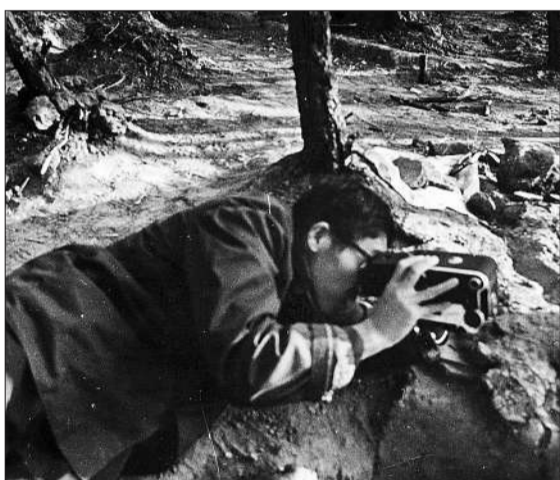
2023年8月5日于河北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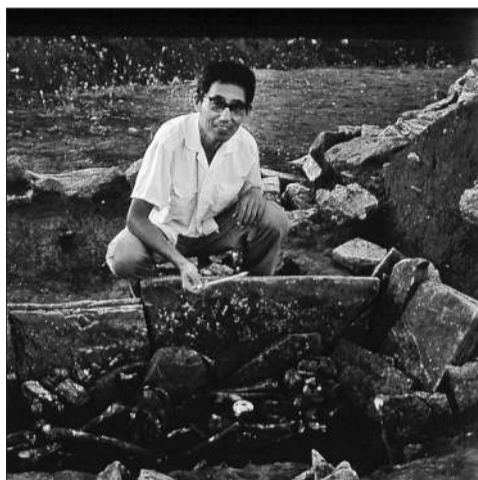
郭大顺(1962年)



1983年,郭大顺在承德避暑山庄考古工作站整理大甸子考古资料。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1983年,郭大顺在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现场。



1984年8月,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墓出土玉龙,郭大顺在现场。

得辽宁“无古可考”。除了有一处西汉村落遗址,就对待自然界而言,西方是“破裂性文明”,东方是“连续性文明”。

龙是中国文明起源最重要的一个象征。1971年,赤峰就发现了著名的墨绿色大玉龙,东山嘴也出土了龙形玉饰,说明他们的信仰已经很成熟了,这不是原始社会能有的,而是文明社会的产物。

之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玉器,但一直找不到出土地,看不到确切的地层关系,就无法确定年代,只能推测是红山文化时期的文物。在找这些玉器出土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牛河梁遗址。我们写的那篇《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也在《文物》期刊发表。

1979年,辽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我们发现了东山嘴遗址。这里发掘了一座左右对称、南圆北方依中轴线分布的石砌建筑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龙形玉饰、两件孕妇小塑像——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当时就想到了文明起源的问题。

这是中国第一个与女性崇拜有关的祭祀遗址,也是我国新石器考古对祭祀遗址进行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欧洲从旧石器晚期就出土过人体雕像,我们国家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几百处,但一直没有发现过。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在东山嘴开现场会时说,“这是考古界等了30年的发现”。

1981年,我和孙守道先生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叫《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把中国文明起源的时代从距今四千年提前到了五千年。这个问题在当时比较敏感,我们提出来也遇到了一些挫折,文稿没有收入会议文集。当时,文明起源的判断标准还是金属、文字、城市三要素。这三者都有,才叫文明起源。但我们认为,中国文明有自己的特点。

旅美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就曾经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所走的道路与西方不同,西方是以发展技术、贸易为主进入文明社会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具有天、地、神、人不同层次的

宇宙观,是以通神取得政治权力进入文明社会的,就对待自然界而言,西方是“破裂性文明”,东方是“连续性文明”。

龙是中国文明起源最重要的一个象征。1971年,赤峰就发现了著名的墨绿色大玉龙,东山嘴也出土了龙形玉饰,说明他们的信仰已经很成熟了,这不是原始社会能有的,而是文明社会的产物。

之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玉器,但一直找不到出土地,看不到确切的地层关系,就无法确定年代,只能推测是红山文化时期的文物。在找这些玉器出土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牛河梁遗址。我们写的那篇《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也在《文物》期刊发表。

## 找到牛河梁,看见五千年前的祖先

1981年,我给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做文物普查培训,一个参加培训的乡文化站长跟我说,他们乡马家沟村老乡家里有个“玉笔筒”。我们借了几个自行车,骑了15公里去看,还真见到了,就放在他家柜子上,里面插着几支笔。我一看,这哪是什么笔筒,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斜口筒形玉器吗?这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之一!

我一问出土地点,村民把我们领到村西部101国道南侧的一个山梁,这就是后来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牛河梁。

从1983年起,我开始主持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在这个遗址群中,先后发现了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重要遗址。这些新发现,每一项都是极为重要的,但对我而言最为难忘的,还是泥塑的女神头像。

当时我们考古队住在老乡家里,墙上糊了很多报纸。头顶上有一张是当年《辽宁日报》登的,报道说有个歌星开演唱会,唱了一首歌,歌词是:“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你,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

我一看,“一把黄土”,这女神头像不就是我们

黄土做的祖先吗?苏秉琦先生称她为“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共祖”。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就是中国人信仰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而红山文化晚期的宗教信仰,就已经由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进入祖先崇拜阶段。

同时,我们还在牛河梁发现了起三层圆的祭坛遗址,这座祭坛和东山嘴的圆丘都位于遗址南部,而方形建筑的庙址在遗址北部。这种北庙南坛的布局,被中国历代王朝继承下来,直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

后来,苏秉琦先生将牛河梁的“坛庙家”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明十三陵联系起来,认为“坛庙家”就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他不设什么标准,也不管那些概念,认为文明就在于传递。世界上其他文明都断了,而中华文明不断,这个连绵不断的根就在这儿。红山文化,就是中华文明这颗大树总根系中的“直根系”。

这么一看,东北地区不仅“有古可考”,还很有自己的特点,有时甚至走在前面。我在东北工作、生活了50多年,成家立业都在沈阳,现在还住在沈阳。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仍在进行,我算是这个问题较早的提出者、参与者和见证人。

现在我很少到考古现场了,但脑子里还在思考。这个月初,我还做了一个讲座,讲从红山到满族的辽河文明,他们生活在东北森林草原地带,以采集渔猎为生,是流动、开放的文化,依赖自然,也尊重自然。红山人是这样,他们把外来的因素吸收过来变成自己的,不排外不忌讳。满族人也是如此,入关以后,他们基本继承了明代的北京城,没有搞大的拆改。

苏秉琦先生谈起考古寻根时,把我的家乡张家口宣化比喻为“三岔口”,因为红山文化、仰韶文化以及河套古文化,在这一带接触交流。我从上学、工作到晚年,一直在探究中华民族文化根脉——也是这个几代学人苦苦求索的课题,真是一种缘分,每想到这里,内心满是幸福感。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根据郭大顺口述整理)

一个事物如果需要花更多时间、精力仍然是值得的,不是更美好吗?或许,开书店也是这种“笨拙生活”的一部分,它依然有着自己素朴的吸引力。

□ 张 丰

8月19日晚上10点,送走最后两位朋友,我开始锁有书店店的门,收银室一个,书店区三个。几天前我第一次锁这些门的时候,用了十几分钟,这一次只用了两分钟。书店正式开业了,我也终于像一个书店店主的样子了。

1

春节回河南老家的时候,我照例去看了徐大哥。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刚结婚不久,和美丽的太太在我们学校旁边开了一家小书店。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去他店里看书。没钱买,就站在那里看,有一天他说:“如果看不完的话,就拿回学校看吧。”

我先后从店里拿走了《茶花女》《战争与和平》,还有很多其他名著,我知道书中有一个巨大的世界。我们就这样爱上了真正的阅读。当然,这样的书店很难赚钱。它开了不到一年就倒闭了,他们不太可能支撑得起书店的亏损。

对我们经常去书店的几位来说,这个书店永远存在。我们每一次回老家,都去拜访徐大哥。徐大哥和太太都保持了阅读习惯,他热爱书法和篆刻,太太则是不错的画家。他们现在依然是小城“文化生活”的灵魂人物。

这是我开书店的深层动力。书店本身很容易垮掉,但是书店的价值却可能很长远。它不仅可能影响到读者,也可能影响自己。我接触过很多正在或者开过书店的朋友,他们的“现状”都让人羡慕,这当然不是指收入或者财富,而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依然天真,依然有精气神,依然向往美好的事物。

我告诉徐大哥要开书店的消息,他非常开心,帮我制作几枚印章。这样,读者来买书的时候,就可以盖在书上留作纪念。他设计了一半,临时去北京办事,把刻章的事拜托给老家的另一个朋友。这让我相信,书店真是神秘的事物,我的书店似乎是当初那家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小书店的延续。

2

在这个时代,开书店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

我认识不少成都的独立书店主理人。雪梨树书店的主理人朱彦说,有一天自己书店的营业额只有170元,骑车回家的时候想起来空调忘了关,又折返回去。我的第一反应是问他:“电费多少?”

大城市的“独立书店”深受年轻人喜欢,除了书之外,店里往往还有咖啡或者精酿啤酒,书店主要是靠这些饮料盈利。但是,很明显,一个书店要赚钱是很困难的。要尽可能找一个房租低的地方,所以书店往往开在老街;大部分事都要自己做,这样可以节约人力成本;为了多点营收,店主不得不在店里待到很晚,陪“读者”喝酒聊天。

即便如此,一个小书店也只能养活店主一个人,这就是“独立书店”的正常状态。书店雇人通常只能找兼职,这样可以用不缴纳五险一金,但是即便是“兼职”,书店也属于收入最低。一个小伙子曾经想到有书店兼职,我告诉他,兼职每小时15元,他有点不爽,找出一份成都市关于兼职工资的指导性文件来看,“这上面写的是,建议时薪不低于20元”。

我一时语塞。这或许是书店很不好的一面。员工倡导美好生活,传递进步的价值观,但是书店的员工,却又属于所有行业中收入最低的。在成都,不管是著名的方所书店还是新华文轩下面的书店,员工收入都很低。那些在书店打工的年轻人,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很难长久留得下,因为书店提供的薪水,根本留不住人。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敢许诺什么远大前程,只能尴尬回应:“可能书店只适合大学生兼职,收入很低,但是这点钱对他们多少有点用。”

3

试营业到现在,差不多10天。这10天,我没有跑步,因为每天光是搬书,把书放到合适的书架上,就已经腰酸背痛了。每天必须喝的手冲咖啡,也已经停了好几天,因为现在书店有咖啡,自己就想偷懒了。

我需要重构一部分生活,这可能是书店给我的不良影响。我必须全身心投入,做到书店和自我的高度统一,店里的书每一本都是我选的,都是我认可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必须和书店保持距离,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一个只卖书但是没时间读书的人,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当然,成为书店的这10天绝不是劳累,它让我感受到“书店”到底是什么。书店开业当天,尽管我多次提醒朋友们不要送花篮、鲜花,仍然收到了两束鲜花,这还是给书店带来了喜气洋洋的气氛。其他珍贵礼物包括:多位作家朋友赠送的签名本;外地朋友下单购买图书,甚至有几位朋友预订“盲盒”,让我选10本自己认为值得推荐的书给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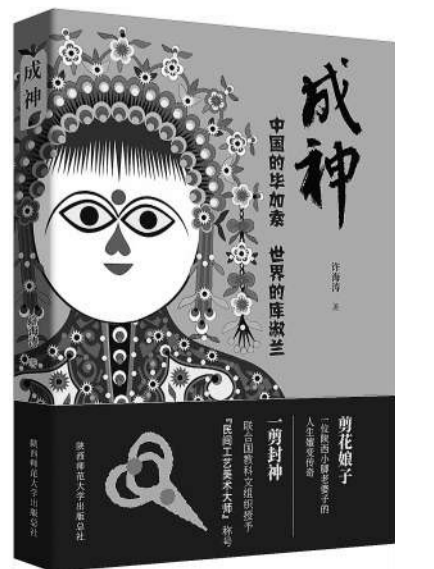
一位住在川西大山深处的朋友,在书店开业那天出山来书店看看,他给我发消息说:“我已经找好车,6个小时就到了。”他说,这很像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从贵州乘坐火车去重庆的西南美院看画展。这让我很感动,在当下,我们已经有少有这样的冲动,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看一个美好的事物。

在向外界的推介中,我喜欢说“有书店距离地铁出口只有200米”“成都市内距离地铁站最近的书店”,强调到这儿方便是书店的一大优势。但是,一个事物如果需要花更多时间、精力仍然是值得的,不是更美好吗?或许,开书店也是这种“笨拙生活”的一部分,它依然有着自己素朴的吸引力。

这些关心让我们明白,书店并不是我自己在开,而是城市生活的一种“联结”。毫无疑问,人们仍然需要书店,至于书店如何活下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过去3年的经历告诉我们,书店和其他公共空间,对抚慰人们的内心有着重要的作用。书店当然是一个极其传统的行业,但是似乎也开始拥有新的内涵。

# 当我要开一家书店

记得库淑兰,欣赏库淑兰作品,研究中国民间剪纸为何能够突破东西方文化隔阂,这些都需要库淑兰的名字更多地被谈起。



# “剪花娘子”库淑兰为何值得被讲述

□ 韩浩月

随着作家许海涛所著《成神:中国的毕加索世界的库淑兰》一书的出版,陕西籍民间剪纸艺术杰出人物库淑兰的名字,再次被更多人注意到。库淑兰是首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中国人,以她为代表的彩贴剪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写作库淑兰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她瘫过脚,只读过几年书,挨过饿,13个孩子只存活下来3个,还有一个脾气暴躁、爱财如命的丈夫……一名女性所能承受的苦难,她几乎都经历了。在她成为名人、拥有“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之后,如何讲述她的一生,对写作者来说是件棘手的事情。《成神》一书作者许海涛选择了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进行表达,看似虚构,其实虚构不过是借文学的手段,来更真实地记录一位值得被铭记的人物。小说采取第三人称的写法,也解放了作者的顾虑,使得《成神》顺利且完整地写作并出版。

贫瘠的土壤滋生一位世所罕见的艺术人物,人们通常会将其形容为“有如神启”,库淑兰几乎

未经任何学习与训练,拿起剪刀就剪出了杰作,符合人们对“天才”的所有想象,但如果了解陕西剪纸的历史与传统以及曾经的普及程度,便会知道“剪花娘子”库淑兰的诞生不是偶然现象,她能够在无数剪纸高手的群体中脱颖而出,恐怕在于她更多地拥有一种处理苦难的能力,还有一种潜藏于内心的文化自觉的态度。

和诸多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们一样,库淑兰对生活的苦难不以为苦,无论周遭的环境有多逼仄、压抑,都不会影响她唱歌、剪纸,兴致好的时候还会舞蹈。当读者为她被生活所捶打而揪心的时候,她正处在超越凡俗的精神境界当中,为能够创作出一幅幅的作品而振奋不已。库淑兰是一盏被点亮之后就会万古长明的灯,但这盏灯于她在地时,最重要的作用是照亮她自己而非别人。库淑兰比谁都清楚,唯有剪纸,唯有她手中的剪刀,才会帮她清掉掉不愿接受的一切,拥有她自己所期望的一名优秀女性该享有的一生。

在中国的神话体系与语境下,“成神”的过程从来都是一条遍布荆棘的窄路,对于“成神”库淑兰已经不能满足世人对她的欣赏与追捧,她要为自己的“艺术神话”增添主要情节:从悬崖掉下来之后宣

布自己“成神”,晚年突然喜欢钱、无钱不剪,只为有生之年看见亲手所建的“库淑兰作品展览馆”得以建成。不得不说,库淑兰不但可以规划自己的创作,更能在人生关键时刻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如有“神力”,却在有了这种力量之后,仍然屈从于所处的环境,比如唯有回到自己破旧的窑洞才能顺利创作,这不禁让人想到,只有身上同时具备人性、艺术性、悲剧性的凡人,才有可能成为流芳百世的艺术家。

毕加索的“朋友圈”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阿波利奈尔,梵高拥有他忠诚的弟弟提奥,库淑兰身边也有一位类似的人物——他是本书的讲述者,也是现实中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馆员。他的名字叫文为群,没有他的发现、鼓励以及全力推举,库淑兰很可能仍然只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剪纸高手而无法成为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有了他,库淑兰则集齐了成为一名大师的所有特点,她的横空出世以及被后人念念不忘,便顺理成章。

记得库淑兰,欣赏库淑兰作品,研究中国民间剪纸为何能够突破东西方文化隔阂,这些都需要库淑兰的名字更多地被谈起,被更多人认识,而《成神》这本书,则起到了一次不小的推动作用。